

试论埃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及交往性特征^{*}

刘会清 王 泰

内容提要 19世纪是埃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时代。在此之前，作为“外部领域”的埃及为人类文明交往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古代世界体系和伊斯兰世界体系的主要构建力量与重要组成部分；在“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埃及被迫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进行“适应性交往”；随着埃及成为现代世界体系的原料供应地 and 产品销售地，政治上受控于英国，埃及完成了其“最后被边缘化”的进程。从文明交往的角度透视，埃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体现了下列一些交往性特征：它是文明交往中挑战与应战的交锋；且是文明交往中现代与传统的交融；更是文明交往中危机和机遇的交织。

关键词 埃及 现代世界体系 文明交往论

作者简介 刘会清，历史学硕士、烟台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烟台 264005）；王泰，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生、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副教授（西安 710069）。

世界体系理论的分析模式

“现代世界体系”，是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的关于15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分析概念与理论工具。其最重要贡献即在于他将15世纪以来的世界作为一个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世界体系”，并对此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国际学术界对于“世界体系”始自何时仍有争议，¹但对于从15世纪以来的“现代世界体系”则给与充分重视和普遍接受。^④

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1）沃勒斯坦所称的“世界体系”是从15世纪至今全世界的经济、政治体系。它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扩大；（2）资本积累过程是世界体系发展的原动力。现代世界体系的主要特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原始资本积累；（3）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形成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以劳动的轴向分工为基础，中心区生产高技术产品，边缘区提供原料和初级产品，并作为中心区产品的市场。因此，中心区与边缘区的生产技术和产品交换是一种不平等交换，正是这种不平等交换为中心区资本积累提供保障；（4）除中心和边缘关系外，现代世界体系还存在不断变化的

^{*} 本文为内蒙古自治区高等教育研究项目“埃及文明的演进与现代化进程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¹ 参见〔德国〕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主编；郝名玮译：《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④ 参见刘健：《“世界体系理论”与古代两河流域早期文明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第62～63页。

霸权和竞争关系；(5)在现代世界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升和降的经济周期。这种周期性又左右着中心区与边缘区的关系，以及霸权与竞争关系的变化。现代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在 1733~1817 年前后的新一轮经济扩张（和通货膨胀）中，欧洲世界经济体突破了它在“延长的”16 世纪创造的边界，开始把广大新地区融入到它的有效的劳动分工体系中。此过程是通过将 16 世纪以来已成为欧洲世界经济体外部领域的地区，融入经济体开始的——其中最特别的，也是最重要的，是将印度次大陆、奥斯曼帝国和西非融入了进来。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绝非由于被融入地区的主动而开始的。此过程是由于世界经济体扩展其边界的需要而发生的，那种需要是世界经济体自身内部压力的结果所致。而且像融入世界经济体这样大规模的过程，是从持续不断的活动潮流中出现的。

沃勒斯坦指出，“现代世界体系”研究的问题是这一融入过程的性质，通过此过程，曾经属于世界经济体外部领域的一个地区，后来变成同一个经济体的边缘区。把这个过渡视为一个中间时期，并把它称为“融入”时期。据此，3 个前后相关而又十分重要的概念被提出，并构成分析使用的模式，即一个地区或国家与现代世界体系的互动“包含一个‘地区’经历的前后相继的 3 个阶段——处于外部领域、被融入、最后被边缘化。”没有一个阶段是静止的，所有阶段都包含一系列过程。¹

作为“外部领域”的埃及

在西方势力入侵埃及之前，作为现代世界体系“外部领域”的埃及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历史进程，从文明和地缘的角度看，埃及是古代世界体系的最主要构建力量之一，也是后来伊斯兰世界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彭树智先生指出，“地缘和环境是一个地区内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群体性格、体制形态等种族或民族异质性指数的根源。”^④埃及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的结合部，其主体位于东北非，东地中海南岸，既接近西亚，又通过地中海与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直接联系在一起，优越而独特的地理位置，再加上埃及人的勤奋和创造力，不仅培育和成长起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与古代世界历史最悠久的文明，而且形成了在古代世界文明交往史上影响力最大的文明。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多种文明交叉之地”，古埃及文明在这里诞生、成长，和大致同时期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遥相呼应，后来的古典文明（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一拜占庭文明）、伊斯兰文明（阿拉伯文明、奥斯曼文明）先后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世界上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文化辉煌和文明多样性。

文明交往论认为，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和交往过程中，文明之间的融合、冲突和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既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又影响到其他文明。如果说，古代埃及文明在其早期发展曾经受到苏美尔文明的影响，那么在后来，则是古埃及文明越来越影响了地中海东部沿岸和希腊罗马文明的发展，特别是对希腊文明的影响巨大。早在 20 世纪初，英国人类学家史密斯就指出，埃及是世界文明的最早创造者，而且，以埃及为中心，文明向外传播和扩散。^⑤文字上，正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苏美尔文字影响了腓尼基文字的形成，进而演化为阿拉米字母（后来的希伯来字母、古波斯字母等字母的来源）和希腊字母（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的来源），成为今日中东乃至西方字母的渊源。文学和艺术方面，除了史诗之外，几乎古代所有的文学体裁，均可在古埃及文学中找到，希腊早期的雕刻也借鉴了古埃及的雕刻。在宗教方面，正如希罗多德所言，“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它们完全起源于异邦人那里……较大一部分则是起源于埃及的”^⑥。在此，需提到的是托勒密埃及时期文明遗产的重要价值。托勒密王朝在亚历山大城建立了博物馆和图书馆，发

¹ 参见 [美国] 沃勒斯坦著；孙立田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 3 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81~182 页。

^④ 彭树智著：《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3 页。

^⑤ See G. E. Smith, *The Ancient Egyptians and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1923, p. X II

^⑥ [古希腊] 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 年版，第 35 页。

展科学文化，在这里聚集了一大批文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的创作和发明，成为古代世界的重要遗产，被后人广为接受。亚历山大作为古代地中海世界的中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为古代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贡献。公元 641 年，埃及为阿拉伯所征服，开始了漫长的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进程；1517 年，埃及又被新兴的奥斯曼帝国征服，成为帝国的一部分，直至 1798 年拿破仑的法军进入埃及之前，埃及都是古代伊斯兰世界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众所周知，辉煌壮丽、独具特色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由包括埃及在内的中东人民共同创造的文明遗产，直至现在它都是对当代世界影响重大的文明之一，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交往的连续性、丰富性和多样性发展。在伊斯兰宗教体制的形成过程中，大教法学家沙斐仪（767～820 年）曾长期在开罗活动，他的主张开创了穆斯林公众（什叶派除外）接受圣训的传统。¹ 埃及人伊本·阿卜杜·哈卡姆（？～870 年或 871 年）所撰写的《埃及的征服及其消息》是关于征服埃及、北非和西班牙的最早文献。^④ 开罗和亚历山大城一直分别作为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而存在，成为中世纪时代中东、非洲、印度和中亚跨地域贸易的中心，还是会聚兼营基督徒贸易和穆斯林贸易的两大枢纽。^④

总之，在被融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前，埃及为我们呈现了人类文明交往早期独特的历史性和地缘性交往特征，其作用就像是一个有久远古老又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的地区。它曾经是诸般文明的中心，各种观念、商货、有时候还包括部队，都从这里向各方辐射出去。在其他时候，它又像块磁石，吸引了许多外界人士，有时候是信徒和朝圣者，有时候是俘虏和奴隶，有时候则是征服者和宗主们。它曾经是四通八达之地，也是市场集散之地，知识和商品从古老悠远的地方带到这里来，然后——有时候是经过大幅改良之后——再传出去，继续它们的旅程。^¼

处于“被融入”进程的埃及

15 世纪以降，随着西欧由农本向重商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工业革命和以全世界为市场的外向型商品经济，人类文明由地缘性的区域交往发展为全球化的现代交往。^½ 1798～1801 年拿破仑率法军对埃及的入侵和占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要求埃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信号，也是第一次世界现代化大潮对埃及传统社会结构的震荡性冲击，从此，埃及开始被融入现代世界。

从人类文明交往的视角考察，埃及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也是埃及面对西方文明挑战而进行适应性交往的过程。彭树智先生指出：“人类对生物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的适应性交往，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赖以创造的文化实践”，而“所谓适应性交往，就是通过开放性和互动性的动态平衡，不断调整和更新文化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以创造和传承民族文明”^¾。

首先，埃及做出了经济适应性交往：棉花种植与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穆罕默德·阿里任埃及帕夏之后，开始大力发展经济作物。1820 年发现了一种质地优良的棉花品种，它“能比其他各种短纤维棉花多卖 2～4 倍的价钱”，阿里以此为契机，“给农民提供新品种的种子，教会他们合理种植，并在许多村庄建立轧棉工场。”棉花很快就成为政府首屈一指的财源。^⑤ 在棉花生产的刺激下，埃及农业生产力得到巨大的提高。1824～1840 年，尽管在军事和工业上抽调大量人力，埃及耕种面积还

¹ 参见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 137 页。
^④ 参见同上书，第 173 页。
^④ 参见 [英国] 弗朗西斯·鲁宾逊主编；安维华等译：《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37 页。
^¼ 参见 [英国] 伯纳德·路易斯著；郑之书译：《中东：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年版，第 22 页。
^½ 参见彭树智著：前引书，第 10 页。
^¾ 同上书，第 23 页。
^⑤ 参见 [美国] 斯塔夫里亚诺斯著；罗荣渠等译：《全球分裂》（上册），商务印书馆，1993 年版，第 216 页。

是增加了约 $1/4$ ¹。由于阿里把出口棉花、谷物等作物所得的资金几乎全部用于工业化，这就奠定了埃及以农业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以棉花为主的农业收入就逐渐成为埃及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这必然造成经济结构的变化，并形成了严重的危机。首先，从农业方面剥夺过多的工业化资金，损害了农业的利益，使农业不能长期有效地支持工业化。其次，农业利益既已受到损害，但为了保证工业化所需资金，就必然要求进一步扩大农作物种植和出口，使农业愈加积重难返，无法脱身。

棉花的种植和出口对埃及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及作用在 19 世纪 60 年代由于美国内战的爆发和持续而凸显。埃及的棉花生产在阿里去世后开始倍增，且几乎全部销往英国。据统计，从 1849~1852 年埃及棉花出口量就由近 26 万堪他尔增至 67 万堪他尔，仅 1850 年一年就达 35 万堪他尔。1861 年美国内战爆发成为埃及走上棉花种植畸形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催化剂。随着棉价迅速上涨，继任者赛义德积极鼓励扩大棉花种植以增加出口，换取外汇。他甚至要求埃及大地主用 $1/4$ 的土地种植棉花。1854 年，埃及棉花产量为 47.8 万堪他尔，到 1863 年他去世时，埃及棉产量猛增至 118.2 万堪他尔，增加了 1.5 倍。^④ 伊斯梅尔继位后，世界棉价继续暴涨，他进一步鼓励棉花种植，并得到大多数地主的积极支持，粮食种植面积被大量削减，棉花种植则迅速遍布上下埃及。正如埃及历史学者所言，引进和扩大棉花种植“也是埃及封建社会变革的一个标志”，其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棉花从此成为埃及的主要农产品，另一方面由于棉花是一种出口商品，因此农业生产不再像封建社会那样只是为了满足当地的消费，而是要参与到世界市场。埃及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动荡不安的世界经济之中。

其次，埃及被迫做出政治适应性交往：改革与殖民主义的入侵和控制。如何在政治上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世界，是 19 世纪埃及历任统治者最主要考虑的内容。如果说经济措施使埃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而欲罢不能，那么埃及统治者的主要政治目的就是谋求独立自主，但终究以失败而告终。

1805 年 7 月，穆罕默德·阿里被任命为埃及总督，开始了其家族对埃及的统治。阿里统治初期，他采取了坚决打击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政策。面对第一次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以及为维护阿里家族对埃及的世袭统治权，阿里对埃及社会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改造，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诸方面。他用自己的力量与智慧强制性地开启了埃及早期工业化。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强大的英国殖民主义势力不愿意看到一个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埃及崛起而损害他们在中东的利益，现代世界体系的本质与殖民主义的本性是一致的，即要把广大亚非拉殖民地变为其原料供应地和廉价商品的销售地。其结果必然造成阿里改革计划的失败。

“最后被边缘化”的埃及

随着棉花的种植和出口，棉花就像吸铁石使埃及经济紧紧地依附于它。由于小麦种植面积被大量削减，再加上由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竞争，小麦种植本身无利可图，短视的统治阶级大力鼓励种植棉花，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埃及经济的独立性基础进一步被损坏，埃及愈来愈深地陷入到世界经济及其危机之中。埃及统治者“改种棉花的决定对埃及经济的发展甚至比修建苏伊士运河有更为深远的影响”^④。棉花作为埃及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占其出口总额的比例 1859 年为 42%，到 1900 年增至 78%。^{1/4} 至此埃及已经在经济上彻底完成了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阿里改革失败后，赛义德和伊斯梅尔分别继续推进了改革，但改革深入的前提和结果是埃及进一步在政治上受到英国殖民主义的控制，由于对外国资本的严重依赖，埃及被更多地卷入世界市场，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殖民列强的侵

¹ [英国] 乔治·E·柯克著：武汉大学《中东简史》编译组译：《中东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 178 页。

^④ 杨灏城著：《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15、120 页。

^④ [德国] 卡尔·布罗卡尔曼著：孙硕人等译：《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商务印书馆，1985 年版，第 423 页。

^{1/4} Hanson J. R. *Trade in Transition: Exports from the Third World 1840 - 1900*, Academic Press 1980 Appendix B.

略。1876年，埃及终于宣告国家破产，国家财政命脉完全为外国资本所控制。随着“双重监督”的建立，继而又形成了“欧洲内阁”，1882年埃及在政治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这样，随着19世纪七八十年代埃及分别在经济上成为西方棉纺织品的原料供应地和廉价商品促销地；政治上完全为英国控制、克罗默出任英国驻埃及总督，埃及完成了“最后被边缘化”的过程，直至20世纪初埃及彻底沦为现代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的组成部分。

作为埃及与现代世界体系的互动，这个几乎贯穿整个19世纪漫长的“适应性”过程对埃及来讲充满了矛盾和困惑。其中体现的交往性特征至少表现在下列3个环节：

首先，埃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是文明交往中挑战与应战的交锋。如上所述，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绝非埃及的自愿行为。作为一个古代世界体系的东方大国和长期处于封建的伊斯兰世界体系的阿拉伯国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要想使埃及融入，就必须在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施加某种持续的压力和作出努力，使埃及可能成为体系中的一部分。而埃及面对这种挑战和压力，也不得不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适应性”的反抗和应战，交往的过程因此也是彼此博弈的过程。穆罕默德·阿里对英国妄想通过控制奥斯曼帝国来控制埃及的企图十分清楚。1815年，他对瑞士旅行家伯克哈特说：“大鱼吃小鱼，……英国总有一天会攫取埃及作为瓜分土耳其帝国时自己分得的一份赃物。”因此，阿里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即是为了打破这一预言，但历史的宿命恰恰在于这一预言在埃及人民身上成为悲惨的现实。

其次，埃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是文明交往中现代与传统的交融。从人类文明交往史来看，广大亚、非国家和地区都曾是立足于农业生产的传统社会，随着它们由“外部领域”“融入”过程的进行，国家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开始发生剧烈变化，这些国家也开始了现代化进程。文明交往论就此给我们提供了以“现代与传统”为核心概念的一系列颇有价值的分析概念：诸如挑战与应战、冲突与整合、外化和内化、全球与本土等。事实上，埃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究其实质，就是一场早期的现代化运动，埃及从此开始成为中东地区现代化实现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阿里王朝的改革措施从文化变迁的角度讲则又表现为一次规模巨大的西方化运动。历史的悖论和悲剧在于，埃及早期现代化以抑制和避免边缘化而开始，以初步实现和完成边缘化而结束。

最后，埃及融入现代世界体系是文明交往中危机和机遇的交织。作为“最后被边缘化”的埃及，无论从其遭受的国际剥削和压迫乃至丧失主权独立和民族自尊，在性质上都不同于希腊化、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它是埃及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民族危机与发展危机。但是，如果说西方化造成对现代化的危害，那么在客观上，危机又孕育着希望和机遇，成为历史的转机。正如马克思的下述论断：“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¹ 马克思的这一科学结论，既适用于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也完全适用于分析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埃及。对于埃及来讲，主要表现为这一时期以阿拉比起义、华夫脱运动为代表的埃及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以阿富汗尼和阿布杜为首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改革主义的兴起，埃及由此开始寻求自己的民族意义（阿拉伯）和宗教意义（伊斯兰教）上的国家属性，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转变。这可能并不是现代世界体系的推动力量——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所愿意看到的。但历史发展的客观后果不以殖民主义的意志为转移，1952年，埃及终于实现了其现代化进程的路标性转换，开始以独立、共和、发展、世俗的姿态跻身于现代中东大国之列。

（责任编辑：徐拓 责任校对：詹世明）

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The Inflows of FDI and ODA into Africa Circumstance Assessments and Prospects

Yan Qifa

pp. 35– 40

Capital inflows play a key role in the African development and are mainly in the form of FDI and ODA. Although Africa absorbing FDI is rising in recent years, FDI grows in limitation featured as small sizes, distribution imbalance between respective countries and industries and growth instability. In offering ODA to Africa, members of DAC are playing a major role, with nowadays China, Russi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coming up. The proportion between

ODA and GNI has a significant meaning, which always determines the degree of the donors' influences over the receivers. Although the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for promoting capital inflows into Africa has formed, there are still shortcomings. Aimed at the long-term and fundamental development, the African countries should mainly rely on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consistent efforts to realize their sustainable and fast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osque Culture and Its Value (2 of 2)

——Discussion upon Current Situation of Moslem Society

Liu Yueqin

pp. 47– 53

The Mosque Culture is the important composition of Islamic culture and symbol of Isla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religious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earlier Islamic political system was the religious and administrative complex, whos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were mainly based on mosques, characteristic of mobilizing, 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Later, religion and administration were separated and not an unification, but many politicians still practiced their political activities in mosques and the common people

became accustomed to receiving their political propaganda there. Whether being religious and administrative complex or separation, the political functions of mosque always exist and political identity exists. With the Islamic social development, mosques have been the products of changes in many fields. Lives around mosques have been mainstream of the Islamic culture which dominates the social life. The Islamic culture has not only the value of religion, but that of politics, society and education.

On the Process and Features of Intercourse of Egypt's Affiliating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Liu Huqing Wang Tai

pp. 54– 58

The 19th century is the historical time for Egypt to affiliate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before which, as the “outer world”, Egypt ha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rcourse of human civilizations, which was the major construction power and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ncient world system and Islamic world system. During the process, Egypt had to practise it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tercourse of

adjustability”. As becoming the raw material supplier and product market of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politically controlled by the United Kingdom, Egypt met its “final marginalization”. The phases of Egypt's affiliating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s characterized as the confrontation of challenges and meeting challenges, harmony of the modern and traditional and the interweaving of crises and opportunities.